

第一章 高洁旷达的隐哲庄周

一、漆园为吏 艰难一生

庄子没有孔孟那么多的教育活动，也没有老子那样扑朔迷离的行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有比较概括的记述：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夫》、《盗跖》、《胠箝》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时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一）庄周故里与漆园吏

司马迁以生动简洁的文字，记述了庄子的生平、人格、文风，

与《史记·老子传》相比较是清晰的，但由于历史久远，晚近学者对其身世仍存有不同的看法。

庄子，名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注：“太史公云：字子休。”不知何据。庄子生活的年代，据《史记》说与齐宣王、梁惠王同时，并辞退楚威王的迎聘，根据齐宣王、梁惠王、楚威王在位的年代，可以大体确定庄子的生卒年代，《庄子》书中记述了一些人物和事件，也可以作为考定的依据。宋代朱熹在回答弟子们“庄子和孟子是否同时”的提问时说，“庄子后得几年，然亦不争多。”（《朱子语类》卷一二五）任继愈曾经将庄子的生卒年归结为五种说法。这是因为先秦诸子除孔子、孟子的生卒年代比较确定外，其余皆为据其生平事迹、交游往来，大致推定的。马叙伦在《庄子年表》中考定庄子生卒年为公元前 369 年至公元前 286 年。学界以为比较接近实际，多采用该说。

最早提及庄子里籍的是西汉的司马迁和刘向。《庄子传》说周“尝为蒙漆园吏”。刘向于《别录》中说：“庄子，宋之蒙人也。”通行的说法，蒙即当今河南商丘县东北。战国时属宋地，西汉时封属梁国。故陆德明于《经典释文·庄子序录》说庄子“梁国蒙县人。”盖同地而异名。现今之安徽蒙城，汉时称山桑，唐天宝元年始改称蒙城。宋代学者苏轼、王安石未能细察，竟将此蒙城认定为庄子故里。苏轼还作有《庄子祠堂记》，实属疏误。

1995 年在山东省东明县召开的庄子研讨会上，对庄子故里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史记》说庄子“尝为漆园史”。关于“漆园”，多数学者以漆园为地名，这就是说，庄子曾经担任漆园这个小邑的地方长官。故阎若璩在《潜邱札记》中说：“漆园为其宦游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括地志》云：‘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此云庄周为漆园史，即此。”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云：“漆园城在（冤句）县北五十里，庄周为吏之所。”而古冤句县治

所在今东明县南部 东明县陆圈镇裕州屯村即漆园故地。《庄子·秋水》云：“庄子钓于濮水。”《太平寰宇记》说：“漆园城北有庄周钓台。”战国时，濮水由西南流向东北，即经今东明县北，至鄄城县南入瓠子河。《庄子·外物》说：“庄子家贫 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庄子》书中还多次提到“河”，也就是黄河。监河侯可能是驻守在黄河附近监督河防、观察水情的官员，应相当于现今黄河水利局的官员。战国时黄河在今河南修武一带折而东北，至今河北黄骅一带入海，距今东明县北部仅六七十里，难怪庄子对黄河那么熟悉。唐玄宗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书为《南华真经》，并将离狐县改为南华县，而现今东明县北部就是南华县故地。“南华”之名盖源于南华山，是庄子长期居住、著书立说、死后埋葬之地。历沧海桑田之变，南华山现于东明县庄寨村以北黄河大堤下，其南有庄子墓，墓南又有庄子观，庄子观始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 628 年），综合以上漆园、濮水、黄河、南华山之说，可推知庄子故里在今山东省东明县。东明县裕州屯村为庄子为吏的古漆园所在地，而庄寨村为庄子生息、著述、安葬之地。庄周故里东明说，是对庄周故里河南商丘说和安徽蒙城说的突破，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学术界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对庄周故里问题达成共识。

晚近，有些学者将“漆园”解为漆树园，这样“漆园吏”就成为管理漆树园的小吏。崔大华根据 1975 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秦律杂抄》竹简，在《庄学研究》一书中指出“漆园”不能只是种植漆树的漆树园，而可能更主要的是制作漆器的作坊。漆的发现和漆树的种植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尚书》和《诗经》都有记载。我国古代对于漆的利用，一是防腐 二是美观。即明代漆器艺人黄成所说：“盖取其坚牢于质 光彩于文也。”（《髹饰录》卷上）战国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漆的应用范围日益扩

大，车辆、兵器、棺槨、乐器以及日用几案、盘、匣、奩皆用漆。50年代，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供职，曾专门编有《战国漆器》一书。从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漆器可以看出当时的漆器作坊已具相当规模，工艺水平也相当精湛。国家设置这方面的官吏来管理经营漆林生产和漆器制作是很自然的。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秦律杂抄》有一条涉及“鬻园”，鬻，又写作髹、髹，一解为赤黑漆，一解作以漆涂物。许慎《说文》云：“漆本作漆，木汁可以髹物，其字像水滴而下之形也。”《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中将“鬻园”解为“漆园”。这条秦律说：“漆园管理不善，被评为下等，罚管理漆园的官吏交纳铠甲一副，管辖漆园的县令、丞及佐各交纳盾牌一张，众工徒各交纳穿甲缘带二十根。漆园连续三年被评为下等。罚漆园吏交纳铠甲两副，并撤职永不叙用，县令、丞各罚交纳铠甲一副。”（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38页）显然，这里的“漆园”不能只是种植漆树的林场，而更主要的是制作漆器的作坊。《庄子》书中多次记述漆的生产或用途，还记述了许多手工艺人的劳动与技艺，这些都可以说明庄子是一位熟悉当时手工生产，曾任宋国管理漆树种植与漆器制作的小官吏。

（二）交友与生平

庄子为漆园吏，或许因为俸禄微薄，或许因为厌倦官场的污浊，或许因为拙于经营，很快就离职了。庄周一生过着十分贫穷的生活，家中有时柴米也难以继，《庄子·外物》篇说：“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列御寇》篇说：“庄子住在穷里陋巷，生活无着，只好依靠编织草鞋度日。由于食不果腹，饿得脖子细长、面容黄瘦。《山木》说：‘庄子与魏王相会，依旧穿着补缀过的粗布衣衫，用麻绳系着破烂的草鞋。’”

庄子一生与惠施交往密切。惠施也是宋人，与庄子同时，而

年龄可能稍大。《庄子·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博学可见一斑。惠施是战国时名家“合同异”派的代表，以善辩名世。同时又是魏惠王、魏襄王时魏国政坛的风云人物。庄子对惠施汲汲追求名利势位表示鄙视和轻蔑，但他们却在若干关于人生哲学问题的争辩中建立了友谊。《庄子·徐无鬼》篇说：庄子送葬，经过惠施的墓地，回头对跟随的人讲了一个故事：郢地有人鼻尖溅上了一滴白泥，像苍蝇翅膀那么薄，让匠石替他砍去。匠石挥动斧头呼呼作响，随手就劈去了泥点。泥点完全去除，但郢人的鼻尖没有丝毫的损伤，郢人立在那儿面不改色。宋元君听到这件事，把匠石叫去，让匠石为他表演，匠石说：“我以前能砍，但是现在我的搭档早已死了。”庄子很感慨地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自从惠施先生去世，我没有对手了，我没有可以与之无话不谈的人了。对于失去一位可以真诚相见、旗鼓相当的辩友表示了深切的怀念和痛惜。

庄子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他曾经有妻室、有儿女。庄子妻子去世，惠施曾前去吊唁。《庄子·至乐》篇说，庄子的妻子死了，惠施去吊丧，看到庄子正蹲在地上，敲着盆子唱歌。惠施说：“你与妻子生活在一起，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年老去世，你不哭也就罢了，还要敲着盆子唱歌，不也太过分了吧！”庄子说：“你这话不对，她刚死的时候，我何尝不悲伤？可是仔细一想，她原初本没有生命；不但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不但没有形体，而且没有气息。在恍恍惚惚若有若无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有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人之生来死往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全是自然的变化。现在，她静静地安息在天地的巨室之中，而我却还在呼天抢地哭哭啼啼，自以为这样做好像不通达自然大化的道理，所以我就停止了哭泣。”从世俗人伦的观点来看，结发之妻，生儿育女，贫困厮守，相濡以沫，离去之际，竟

然鼓盆而歌 实在不近人情。但庄子认为 人之生 来自于自然 人之死，返归自然；对待生死，应当持纵浪大化、不喜不忧的态度，这是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观点。

庄子的一生是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度过，但是生活的坎坷并没有影响他对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

二、傲视王侯 独立特行

（一）讥邀宠为砥痔

庄子虽然遭受着贫困的煎熬，但却保持着精神的高洁。庄子将“贫”与“惫”区别开来。《山木》篇记载，庄子穿着补缀过的粗布大衫，用麻绳系着草鞋与魏王相见，两人有一段对话，“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贫，贫穷。惫，困顿。庄子认为，衣弊履穿是贫穷，而非困顿。士人有道德不能实行，这才是困顿。这是因为在不利的形势下，不能施展他的才能罢了。现在士人处在君主昏庸臣子作乱的时代，要想不困顿，怎么可能呢？庄子虽然生活贫苦、仕途困顿，却并没有随波逐流，与昏上乱相同流合污。

《庄子·列御寇》篇舐痔得车的故事，说明了庄子对名利的淡泊和对权势的轻蔑，表现了士人“义不失道”的高风亮节。

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替宋王出使秦国，出发时，宋王赏他几辆车。到了秦国，得到秦王的欢心，又赏他百辆车。曹商回到宋国，向庄子炫耀自己的能耐，说：“住在偏僻狭窄的小巷里，家境贫寒，靠织履为生，饿得脸色发黄，脖子瘦长，这是商所不及

的。一旦出使，使万乘君主觉悟，随从的车子就有百辆之多，这是我的长处。”庄子说：“秦王有病求医，答应能够使毒疮溃散的，可得车一辆，能够舐痔疮的，可得车五辆，所治的病越卑下，得的车子越多。先生您莫非是为秦王舐痔疮的吧？要不是怎么能得到这么多的车子呢？你滚开吧！”

庄子对惠施的有趣的讥讽和对曹商的尖刻的挖苦，一方面表现出他对权势名利的轻蔑，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对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追求。

（二）观相位如腐鼠

《庄子·秋水》篇记载了一个故事，表现出庄子与惠施对待高官势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惠施做梁国的宰相，庄子要去见他。有人向惠施说：“庄子此行是要来取代你的相位的。”于是惠施十分恐慌，下令在国内搜寻庄子，搜了三天三夜。庄子去见惠施，对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雏，你知道吗？鹓雏由南海出发飞往北海，不遇梧桐树它不休息，得不到竹子的果实它不吃，得不到甜美的泉水它不喝。有一只猫头鹰找到一只腐烂的老鼠，鹓雏刚好飞过，它恐怕鹓雏夺走它的臭老鼠，于是仰头怒视，发出‘吓’的声音。现在你想用你的梁国来吓我吗？”

《庄子》书中还有两则庄子却聘的记载。

《庄子·列御寇》篇记载，有人礼聘庄子做官。庄子回答使者说：“你见过做祭祀用的牛吗？披着纹彩锦绣，吃着嫩草大豆，可是等到一朝牵入太庙的时候，它虽然想做一只无人饲养的小牛犊，还能办得到吗？”

《庄子·秋水》篇记载，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威王派了两个大夫去转达他的意思，说：“楚王希望将国内的政事委托给先生。”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个神龟，已经死了三

千年，国王把它用绸子包好盛在竹箱里，藏在庙堂之上。请问，这只龟是宁愿死了留骨而贵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巴里爬行？”两个大夫说：“当然还是宁愿活着在烂泥里爬行。”庄子说：“那么请便吧！我还是希望拖着尾巴在泥巴里爬行。”可见庄子把名利权势、荣华富贵看作人生的负累，是对独立人格的屈辱，对精神自由的束缚。

三、高洁旷达 隐士风骨

（一）道家与隐士现象

道家与隐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老子传》中，称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是“隐君子也”。司马迁又在《史记·庄子传》中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庄子思想上归本老子，也是一位著名的隐士。

隐士现象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隐士历来受到中国士人的推崇。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传的第一篇即《伯夷列传》，对周初的隐士伯夷、叔齐大加赞扬。孔子在《论语》中称隐士为“逸民”即节行超逸之人。《论语·微子》说：“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这里举了七个逸民的名字，他们身处乱世的态度各不相同。孔子特别推崇伯夷、叔齐。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死了，互相推让王位，都逃到周文王那里。周武王起兵伐商纣，他们拦住车马劝阻，认为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以暴易暴，不可以谓之仁。周朝统一天下，他们在思想上不屈服，在政治上不合作，不接受周朝的俸禄，隐居首阳山，采集一种叫做‘薇’的山菜吃，后来饿死在山间。孔子称赞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即不动摇自己的信仰，不辱没自

己的身份，是最值得崇敬的人。

孔子是一位志在有为、志在救世的思想家，但他也时有隐士思想流露出来。他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作者七人矣。”（《论语·宪问》）贤者逃避恶浊的社会而隐居，次一等的择地而处，再次一等的避免不好的脸色，再次一等的回避恶言，像这样的人已经有七位了。这说明孔子对隐士思想是赞同的。尤其在他的主张得不到当权者的认同，他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的时候，也表现出归隐的倾向。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道得不到实行，我就要乘木筏飘海而去。大概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老子“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史记·老子传》）的教诲，孔子表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说明在春秋战国之际，隐士思想在士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真正的、彻底的隐士，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陆游有一首诗专门说这件事。“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许错到今。”真正的隐士，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远，而被人知晓并且名声彰赫的隐士，已经是背离了当初逃隐的初衷。姑且不要说严光之辈，就是巢父、许由被人发现了踪迹，有了高尚其志的名声，也就大错特错了。诗中提到的严光、巢、许都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士。严光，字子陵，东汉会稽余姚人。年少有高名，曾与汉光武帝刘秀一起游学。刘秀称帝后，严光改变姓名隐而不见。刘秀派人四处查访，后来遣使三聘，方肯入京。授谏议大夫职，不受，退隐富春山。巢、许指巢父与许由。传说为三代时隐士。皇甫谧《高士传》说，许由字武仲，尧闻其贤，要将王位让给他，许由不受，退隐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要他作九州长，由不愿听这件事，洗耳于颍水。当时巢父牵着

牛要给牛饮水，见到许由洗耳，问其缘故。许由说：“尧要我作九州长，我很厌烦听到这件事，所以洗耳以求清净。”巢父说：“你如果住在高岸深谷之处，道路不通，谁还能见到你？你肯定是四处周游，欲求声名闻达。不要脏了我的牛嘴。”于是牵牛至上游饮水。许由死后葬于箕山。陆游的诗即是说，真正的彻底的隐士应当是息影山林，不为人所知；为人所知，也就不是真正的隐士了。我们一般所说的隐士为有条件作官，但却不去作官的士人。

退尘俗隐山林而不仕与千方百计入仕为官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处世态度。中国古代的士人，其终极目标不是当学者，而是当官。孟子说：“士之仕，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求学的目的就是要入仕。士人们的主张要被诸侯采纳，才能入卿为相、平步青云。否则，就是身怀雄韬伟略，有盖世之才，也无济于事。李商隐有两句诗说：“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如钩。”一对被远山重水隔断的情人，像月缺一般，不得团圆，月夜黄昏，登楼远眺，只是玉梯虚设，故而思绪万千，欲望还休。士人如果不被权贵接纳，也还是如同虚设的玉梯，无处施展，最终像被隔绝的情人。这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决定了不少士人千方百计依附权贵。所以颀颜献媚者有之，沽名钓誉者有之，无非是为了当官。

但是中国古代的士人又有着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孔子称赞伯夷、叔齐“不降其志”的“志”，孔子自己“守死善道”的“道”，就是他所追求的价值理想，是他的政治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的提炼和升华。为了实现他的价值理想，可以牺牲一切个人利益，甚至于生命。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天下清明，君子得志，“道”得以施行；天下黑暗，君子守道，不惜为“道”而死，没有听说过牺牲“道”来迁就当世王侯的。“以身殉道”是一种无私的献身精神。士不同于一般社会成员，他们能超越自身经济地位的

狭隘限制，而有坚定执著的志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士不以个人生活安逸为念，“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士胸怀开阔，“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以弘道为己任，是士人的共同特点。士阶层中有一部分人，坚持自己的价值理想，不趋炎附势，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所以才产生了有条件作官为吏，却又不愿放弃理想追求而去为官为吏的隐士。庄子就是这种隐士的先驱之一。

（二）老庄型隐士

庄子远慕巢许，近宗老子，其隐而不仕有着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庄子对避世之士的向往。《庄子·让王》篇集中叙述了巢父、许由一类薄视帝王，视富贵若浮云、弃名位如弊履的隐士。该篇有一个故事说：舜把天下让给善卷，善卷说：“我自立于宇宙之中，冬天穿毛皮，夏天穿粗布。春天耕种田地，体力足以胜任劳作。秋天收获的粮食，足以填饱肚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天地之间逍遥舒适，我要天下做什么？可悲啊，你不了解我。”善卷不接受，于是离开，避入深山，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重生全身，视天下为余赘，满足于自食其力的安适生活是当时一部分隐士的价值追求。但是庄子与那种息影山林的避世之士并不完全一致，《缮性》篇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庄子正是这样一位隐士。

其次，由于庄子的道德理想不能实现。庄子近宗老子，独阐道论，从道论的角度出发，治理国家要“无为而治”，也就是老子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而庄子的时代，诸侯们为了争为霸主、一统天下，搜括百姓，战争连年，民不聊生，与老子、庄子的主张恰恰背道而驰。《庄子·山木》载，庄子见魏惠王说，

衣服破烂是生活贫穷，而非政治上的困顿；士人有道德不能推行，这才是困顿。庄子还向魏王讲了一个寓言：树林里跳跃的猿猴，当它爬在楠、梓、橡、樟等大树上的时候，攀缘着树枝，灵活地跳来跳去，十分得意，就是善射的羿和蓬蒙也对它无可奈何。等到它跳落在柘、棘、枳、枸等多刺的树丛中，就是小心谨慎，也还是战战兢兢。它们的筋骨并非因紧张而不柔和，而是因为所处的形势不便，无法施展它们的技能的缘故，这种情况就好像现在士人处在君主昏庸、臣子作乱的时代，要想不困顿，怎么可能呢？

再次，庄周在名利势位和个性自由之间，更注重个性的自由。《史记·庄子传》中，庄周对楚国的使者说：“千金，不能不说是重利，卿相不能不说是尊位。然而，你没有看到郊祭用的牺牛吗？好草好料，喂养几年，然后披上锦绣送入太庙，杀之以祭神灵。当此之时，虽然愿意当一头孤零零的小猪，还能办得到吗？”庄周认为入仕为官，受权贵们的蹂躏约束，实在不如自由自在地过贫穷的生活。当然庄周的选择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有着密切的联系。道家思想的体系熔铸了当时大量的思想资料，既有天道运行的规律，也有社会历史和人生处世的经验，是古今成败、存亡、祸福之道的概括和总结。历史的记载和庄子的阅历都使他了解到宦海沉浮、仕途险恶，功名利禄，不能长久，一旦误陷其中，虽欲解脱，但身不由己，悔之莫及。所以庄子视相位为腐鼠，视约宠为舐痔，辞相位之聘，绝尘富贵权势，甘愿无拘无束地过清贫的生活。

没有炙手可灼的权势，没有千金重利的俸禄的庄周，在政治上、生活上实际等同于庶民百姓。困窘织履，贷粟监河，使他深切地了解到人民的疾苦；也使他清醒地观察到，大盗窃国为诸侯、小盗窃钩被诛杀的荒谬的社会现实。因此，激发了他对君上乱相的批判以及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老庄，尤其是庄子，是中国隐

士阶层的先驱，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世把宗承老庄思想的隐士称为老庄型隐士。

四、 千古奇葩 《庄子》一书

（一）《庄子》的版本与注释

庄子的一生没有令世人称道的显赫业绩，但他为后人留下的《庄子》一书，却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庄子》书上承《老子》，下启《淮南子》，是其间庄子学派的一部论文集。《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分别记载了当时的多种版本。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记载了庄子的几种古本：崔譔注十卷，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司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等。

先秦的许多著作，都不是单纯某一个人的作品。古人的文章写在竹简上，容纳字数甚少，故往往单篇行世，至汉代金匱石室之书，多易简为帛，容字较多，于是变篇而为卷，合卷而成书。所以，当时的许多书相当于现在的论文集，由于组合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版本。刘向所辑《庄子》五十二篇，当是汉代比较流行的、保存篇目较多的一种版本。按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五十二篇古本的篇目构成是：“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内、外、杂篇都见于今本《庄子》，人所共知。《解说》三篇是什么 据后人考证 大概是《淮南子》的作者对庄子的内容概述或片断的解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五十二篇本‘言多诡诞 或似《山海经》 或类占梦书 故注者多以

意去取……唯子玄（郭象）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今本庄子即郭象三十三篇本，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

《庄子》一书注本较多，以清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最为完备，是研究者的必备之书。它收录了晋代郭象的注，唐代成玄英的疏，陆德明的音义，清代卢文弨的校勘及王念孙、俞樾等人的训诂考证成果。该书民国年间收入《诸子集成》，1961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单行本，后多次印行。1983年中华书局印行了陈鼓应先生所著《庄子今注今译》，该书吸收了近现代研究庄子的最新成果，注解详尽明捷，今译信雅流畅，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都可从中受益。

（二）内篇与外杂篇的关系

自秦汉至宋代千余年间，人们一直认为《庄子》一书是庄周自己的作品。苏轼《庄子祠堂记》从庄子思想的前后抵牾中发现了一些问题，认为《渔夫》、《盗跖》等四篇为伪作。自此历代学者对《庄子》书中究竟哪些篇目是庄周自己的作品进行了许多考辨工作。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究竟《庄子》书中哪些篇目代表庄子思想的问题，也就是了解、研究庄子思想应当如何处理庄子与《庄子》一书的关系问题。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1. 研究庄子，应当打破内外篇的界限。王叔岷先生在《庄子校释》自序中说：“郭本内外杂篇的区画，盖随意升降。……至于外杂篇诸贤多疑为伪作，然今本内、外、杂篇之名，实定于郭氏，则内篇未必可信，外杂篇未必尽可疑。……故《庄子》外杂篇之真伪，诚有待于商榷，决不可囿于郭氏之区画，而轻于致疑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提出，应打破内外杂篇的分别，以《逍遥游》、《齐物论》为主要线索，参考其他各篇以期对庄子有全面的了解。严北溟先生在《应对庄子重新评价》（《哲学研

究》1980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庄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以整部《庄子》为基础的。即使作者纵非一人,而发生影响的主体则是非庄子莫属。

2. 外杂篇代表庄周思想,内篇代表庄周后学的思想。这是任继愈先生在《庄子探源》(《哲学研究》1961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的新观点。其论据主要有:(1)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的篇目全在外篇。(2)庄子思想宗承老子,老子思想中有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猛烈抨击和消极处世两个方面,庄子也是如此。这在外、杂篇表现最为明显。(3)《荀子·解蔽》篇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这就指明了庄子的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而反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篇目恰在外篇。(4)篇分内外起于两汉,所以内篇应当是汉代编辑的结果。内篇篇名离奇,外篇则以篇首二字为名,保持古例,故内篇晚于外、杂篇。任先生在后来的论著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论据则主要是前两点。

3. 传统观点认为内七篇代表庄子思想,是庄周自作。外、杂篇主要是庄子后学的作品。任继愈先生的新观点发表以后,张德钧先生撰写了《〈庄子〉内篇是西汉初人的著作吗?》(《哲学研究》1961年第5期)一文,对任先生新观点的论据逐一进行商榷,认为新观点难以成立。张恒寿先生认为,要对《庄子》思想进行研究,就要对全书各部分都加考察,不能漫信旧说,不加分析。即使内篇真为庄周所作,也要和对待外、杂篇的方法一样,经过审查,重新确定。他提出,试图打破内、外界限,推导《庄子》书中的较古篇章。他发表了一系列考证文章,对内篇的真伪和时代作了严密的考察,这些文章多集中于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庄子新探》一书中。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内篇基本上是属于先秦早期作品,为传统观点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论证。这些论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思想、文风方面

荀子是先秦第一个评论庄子的哲学家。其于《解蔽》篇评论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这与庄子因循自然、否定智辩，主张人应当无条件地与天合一的思想是一致的。“解蔽”即去除偏见。《解蔽》篇重在批判，而无肯定之义，更没有涉及宇宙观的问题。司马迁在《庄子传》中提出《渔夫》、《盗跖》、《胠篋》三篇是为了说明庄子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不能作为司马迁没有见到内七篇的根据。《庄子·天下》篇的写作时代，近代学者多认为在战国末期。故《天下》篇虽非庄子手笔，但写作时代距庄子较近，仍不失为研究庄子哲学的重要支点。《天下》篇所叙述的庄子的文风与思想皆与内篇相契合。

(2) 史实

《庄子》书中关于庄周生平事迹及言论的记述共 30 则，计 6000 余言。这些材料在《庄子》一书中的分布情况是外篇 13 则，杂篇 13 则，内篇仅有 4 则。据张恒寿先生考证，《逍遥游》末章，系抄袭本篇各章而成，《德充符》末章似为晚出。这样内篇仅有两则，这些记述庄周生平事迹的材料如此集中地出现在外、杂篇绝非偶然，说明外杂篇多出庄周后学之手，从而为内篇早出提供了一个根据。

(3) 从汉语史的角度证明内篇早出

唐钺先生在《文史》第 15 辑《考订古书撰作年代通则补说》一文指出，抽象名词或其他词类，本为单字者，有以此种两单字连成一词而又只表一义，则此词比较单字之词晚出。刘笑敢在《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一书中指出，《庄子》内篇与外杂篇在使用概念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内篇虽然用了道、德、性、命、精、神等词，但没有使用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而在外杂篇中道德、性命、精神三个复合词则反复出现。他进一步考察了

《诗经》、《尚书》、《国语》、《论语》、《墨子》、《老子》、《孟子》等战国中期以前的著作，都没有发现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按照时间的顺序继续考察，《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出现了这三个概念。至汉代《新语》、《淮南子》、《论衡》中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概念的使用就更普遍了。以上事实告诉我们：《庄子》书中内篇与外杂篇之间在使用概念方面的区别，正是历史为我们留下的客观的年代分界标志。这说明只有内篇可能是战国中期的文章，庄子恰是战国中期人，而外杂篇只能是庄子后学的作品。

(4) 张恒寿先生对《庄子》与《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诸书有关章节详加比较后指出，内七篇除少数章节外，基本上属于先秦早期作品。

(5) 王孝鱼先生在《庄子与惠施——〈庄子内篇新解〉前言》（《晋阳学刊》198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王船山曾不敢十分肯定地认为，庄子或因惠施而有内七篇之作。这个见解对他启发很大。他认为内七篇是庄子专为惠施而苦心孤诣、细心经营写出来的。《庄子内篇新解》一书即贯彻了这一观点。

综上所述，可知《庄子》是庄子及其后学的一部论文集。大体上可以确定《庄子》内篇是庄子自己的作品，是庄子思想的核心部分。外杂篇为庄子后学作品，反映了庄子学派思想的发展演变。《庄子》书内篇和外杂篇在写作年代上是先后关系，在思想内容上是源与流的关系。本书对庄子智慧的介绍是宏观的、整体性的，取材以《庄子》内篇为主，兼及外杂诸篇。